

河泊所简牍： 汉代治理西南边地的文献见证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考古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大量汉代封泥、简牍、大型建筑基址、宽达12米的道路和丰富器物。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过初步清洗和红外线扫描,得知简牍共1万多片,其中2000多片写有文字。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利用红外扫描图像,对残片试作缀合,对文字进行释读,已取得初步进展。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汉代简牍的出土,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日前在昆明召开的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专家咨询会上,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介绍了其团队整理、解读的阶段性成果。他指出,这批简牍内容丰富,包括有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籍、名籍、书信和典籍,涉及政区建置、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状况等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汉代设立益州郡,对西南地区进行有效治理、开发的重要见证。

简牍中目前辨认出来的益州郡属县,有滇池、俞元、收靡、谷昌、秦臧、邪龙、律高、不韦、嵩唐、比苏、建伶、来唯十二个。《汉书·地理志》记载的益州24县,已发现一半。其中一枚记:“己丑滇池守令邪龙长武、守丞……”“守”指代理。简文表明名字叫武的邪龙县长官代理滇池县长官。其中滇池县长官称“令”,邪龙县长官称“长”。《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续汉书·百官志五》“州郡条”注引应劭《汉官》曰:“三边始孝武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益州郡县未必严格按万户规模确定县长的称谓,但称“令”称“长”应该有区别。还有一枚记:“嵩唐民或贾市□□□□出入颇相侵□□田作事甚不可自今以来民有自……”嵩唐位于益州郡西南,约在今云南省保山市与云龙、永平一带。推测此为益州郡的文告,涉及境外贸易的管理。此外,“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记述,与石寨山墓地出土的“滇王之印”以及同在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滇国相印”相印证,显示在益州郡建立后,汉朝在滇王国设相及其佐吏,用特别形式进行治理。

简牍中有许多件户版(户籍)。其中一件写作:“朝奉宗宁口里户人仕(士)伍奉年卅五算(算)一卒 贫……”上端大字书写户人(即户主)姓名(朝奉宗),随后记录其居住的里名、身份(士伍)、岁数、徭役等,后面的户人名字承前省略姓氏。这种格式曾见于湖南长沙东牌楼、尚德街和四川渠县城坝等地发现的简牍,被学者认为是东汉户口简的特征。出土的多件户版是当时在今云南地区推行编户齐民制度的真实写照。

有一枚木牍写有“建伶髡钳吴屯代杨冈”等字。髡钳是刑徒称谓,吴屯、杨冈是人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在墓志铭铭文的格式与内容的特殊情况部分列举多件类似铭文,如“右部五任下邳下相髡钳曹福代胡非永初元年九月廿六日物”“五任南阳阳鬼新胡生代路次元初六年闰月十四日死”,认为这说明在汉代代人代刑的情形较为常见。河泊所遗址出土的这枚木牍记录的格式与东汉刑徒墓地铭文一致,但用简牍书写,出土在官署遗址,具特别意义。

此外,有件封泥匣上写有:“梓潼富里周得弟(弟)一车辰。”梓潼是广汉郡属县,在今四川梓潼。富里是里名,周得是人名。记录显示这件封泥匣封缄的物品,是在某个车队由周得负责的第一辆车上的第五件(用地支记序)货囊或货箱中。另有一枚木牍记“就(就)车一十九两(辆)”,二者合起来表明,当时昆明一带的道路建设和车辆运输有较大规模,可能属于《史记·平准书》“通西南夷道”的组成部分。



简牍中还有多件书信。其中一件经缀合可复原大半,首行写“富紉伏地再拜请”,次行写“青、平、子林、文先、少……足下毋恙,甚善。春时不和,愿强进酒食,近衣,慎察左右……”是富紉发给青、平、子林、文先等人的信函,款式、用语与里耶秦简和西北汉简出土的书信颇相类似。

有两件分别写作“季氏旅于”和“能救与对曰不”残片。《论语·八佾》记载:“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相形之下,得知这两支残片可以缀属,属于《论语·八佾》。可见《论语》在当时当地流行。

还有几件简牍有纪年。其中西汉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七年(公元前80年)和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各一件,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一件。此外,还有一片记有“永建五……”如果永建代表年号,则是东汉顺帝所有(永建五年相当公元130年)。结合内容分析,河泊所简牍大致属于两汉时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件传递文书时使用的封检,均题写“滇池以亭行”五字。这是秦汉封检题署的常见格式,“以亭(或‘邮’)行”之前的地名是文书发送的目的地。因而,这两枚简的出土地极可能就是滇池县。

通过简牍记载可知,益州郡县建置之后,汉朝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系统地扩展到当地,同时还传播儒家典籍及其代表的主流思想,有效地进行治理,为开发西南地区、为在辽阔疆域上建立、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陈伟特别指出,遗址出土的简牍,一般保存状况都不够好,河泊所简牍也是如此。除了一些简牍有被火烧残的情形之外,还有不少简牍断裂成若干碎片。初步整理中,研究团队发现较多残片可以缀合起来,拼合时有的茬口对合得非常好。如前面提到的邪龙县长官代理滇池县长的木牍,就是由4片缀合而成,书信则由5片缀合而成。这从一个侧面体现,河泊所遗址发掘和清理工作相当细致。

(执笔:蒋志龙 李天虹 雷海龙)

第二届全国文博社教特别推介案例

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中国科学技术馆

第二届全国文博社教十佳案例名单

(按行政区划排序)

“旗装雅韵”数字教育关卡制互动课程	吉林省博物院	“博爱学堂——少年中国说”研学思政课	辛亥革命博物院
“百物进百校,百讲进百年”——中共一大纪念馆百件文物藏品进课堂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听见简牍”系列文博广播融媒体项目	长沙简牍博物馆
“龙·鸟”时光机系列教育活动	常州博物馆	“永远的三峡”系列教育课程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三点半博物馆”课后服务项目	江西省博物院	“重回大唐”系列社教研学课程	西安博物院、苏州和云观博有限公司
“陶于河滨”博物馆黄河文化主题研学课程	山东博物院	“博悟·关爱”系列公益活动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第二届全国文博社教优秀案例名单

(按行政区划排序)

“夜宿海博·畅游科海”系列社教活动	国家海洋博物馆	“云上龙门 牵手云冈”系列直播	龙门石窟研究院
“铜喜铜乐·博物馆同您七天乐”系列访谈节目	山西博物院	“云端打卡湖北省博物馆新馆”系列活动	湖北省博物馆
“汉字之旅”主题教育项目	辽宁省博物院	“阅读湖湘 红色之旅”教育项目	湖南博物院
赓续红色血脉 厚植爱国情怀——“九一八”研学足迹点亮全国”研学综合实践活动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共产党人刘少奇”系列微故事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魔都与新城”系列综合教育项目	上海博物馆	禁毒宣传系列广播剧——“不能忘却的历史”	鸦片战争博物馆
“博物馆+社区”共同体建设项目	南京博物院	“遇见”——深圳博物馆系列形象宣传片	深圳博物馆
“考古六朝·双城记:从南京到镇江”系列研学课程	南京市博物总馆六朝博物馆、镇江博物馆	“跟着郑和下西洋”研学教育课程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雨花英烈的艺术人生——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红色文化进校园”项目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红岩故事宣讲团”宣讲活动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博物馆学校——苏州博物馆“@苏博”系列教育品牌	苏州博物馆	“我来金沙讲党课”教育项目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吴中博物馆主题悦读沙龙	苏州市吴中区博物馆	草堂耕诗 四季研学——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项目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一起,寻找文明之光”计划系列社教活动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中国传统服饰——博物馆助力职业学校课程	福建博物院、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得意之笔——“红色+”研学实践课程	四渡赤水纪念馆
“苏区精神永放光芒”情景故事讲演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秦兵马俑多维融合型深度研学活动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孔子密码”主题研学课程	孔子博物馆	“盛世壁藏”研学课程	陕西历史博物馆
舞动的汉字——汉字文化普及互动体验课程	中国文字博物馆	“一起向未来——红色体育进校园”品牌教育项目	延安革命纪念馆
“历史的音乐厅”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特约体验活动	河南博物院	遇见敦煌色彩——矿物质颜料制作壁画及壁画绘画体验课	敦煌研究院
		“保护母亲河 生态青春行”研学活动	张掖湿地博物馆
		“多元华彩 融荣共生——走近青海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系列课程	青海省博物馆

一份特殊的会员录：《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会员录》

李安萍

《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会员录》是江西萍乡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彭树敏烈士的遗物,为线装16开本,总12页。

正文为蓝色石印字,封面上端盖有“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中英文两种文字的蓝色圆形印章,下端左右两端各有一个五角星的小圆圈。书中序言为江西省赣州籍会员肖健在法国巴黎所著。书中详细记载了25名江西省留法勤工俭学会员的姓名、年龄、性别、国内毕业学校、法国留学学校及工作、学习专业、国内通信处、法国通信处等内容。这本会员录封面还竖写着“后裔继子彭浩收藏”,从此可知,这本弥足珍贵的会员录入馆前一直为彭树敏的继子彭浩保存。1982年萍乡市党史办刘传政等从彭树敏的继子彭浩家中征集,后拨交给安源纪念馆。1994年5月7日,《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会员录》经国家文物局全国馆藏一级近现代文物鉴定组鉴定为一级文物。该会员录详细记录了江西留法勤工俭学人员的具体情况,为研究20世纪20年代江西留法勤工俭学人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彭树敏(1897—1926),江西萍乡人。出生于萍乡市腊市镇凤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1年考入萍乡县立中学。1915年毕业后,在外祖父家学习古书。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产生了出国留学学习科学的想法,以实现报国救民的愿望。1920年2月,经上海勤工俭学会介绍,与全国各地的同学33人,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到法国马赛勤工俭学,在木兰公学习。1922年7月,加入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9月,经中共旅欧支部选派与聂荣臻、蔡畅等一批党(团)骨干共27人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五卅惨案”后奉命回国,被派往江西安源煤矿从事工人运动,主要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将所学马列主义理论与安源工人运动相结合,启发工人团结起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6年先后被派往郑州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天津从事军运工作、北京从事地下工作。北伐战争爆发后,因被派往



江西九江组织铁路工人罢工而被捕,被捕后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同年9月18日,英勇就义于九江浔阳江畔,年仅29岁。

五四爱国运动前后,中国广大青年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下,目睹国势危亡、社会腐败、教育遭到摧残等现状,为了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追求真理与民主、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大批爱国知识青年投入了赴法国开展勤工俭学的运动。为“输世界文明于国内”,1912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这种以“俭以求学”的方式留学在当时中国社会上是一个创举,开启了中国留学教育史上一种新的留学理念。

1919年至1920年间,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已达到2000人左右。1921年后,由于法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勤工俭学学生的选拔问题以及中国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学生继续留在法国,边做工边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大多数进入了法国高等教育机构继续深造;而另一部分学生经历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种种境遇,对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有了更多的了

解,对中国社会的落后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变革中国社会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当中的大批先进分子或回国,或转赴苏联学习。从此,他们踏上新的征程,投身革命事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早期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都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来自全国18个省,大多数是16岁至30岁的青年,他们有的先工后学,有的先学后工,有的边工边读。勤工俭学学生只靠微薄的维持费度日,生活极为艰苦。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由于本身无资金来源,且其他收入来源有限,要接济许多在校或在在外等候做工的勤工俭学学生确实很有困难。为了方便联系、互帮互助,以达到共同实现工读的良好愿望,江西省赣州籍会员肖健发起在巴黎成立了江西省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那么,究竟有多少江西籍的有志青年走出国门、远赴法国、勤奋学习呢,他们是哪些人,后来又有什么作为呢?据史料研究,学术界对赴法勤工俭学的江西籍人数有不同的说法,目前大致有三种:

一种说法是28人。主要依据是周恩来于1921年12月20日在天津《益世报》上连载的《勤

工俭学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一文。文中列举了一份各省人数清单:“据各省勤工俭学委员会的调查,勤工俭学学生的总数有一千五百余人,内中俭学生占四百五十九人。今先将各省的人数列下:……江西(勤工俭学)26(俭学)2(总数)28……”

第二种说法是30多人。这是江西知名学者刘勉玉教授在1984年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征集委编辑出版的《江西党史讲义》中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一文提出来的。

第三种说法是25人。依据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彭树敏烈士的遗物《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会员录》。《会员录》详细记载了当时参加勤工俭学的25位江西籍人士:吴肇周、黎开绳、江学轩、傅德尧、周映文、肖复之、蔡源高、文明升、彭树敏、彭树茂、肖健、游嘉训、黄国俊、饶来杰、饶国璋、涂名扬、邓荣德、傅见贤(傅烈)、李凌鹤、郭志汾、陈发祥、谢远濡、汪恩广、汤昌椅、王仍。在这25人中,萍乡籍10人,进贤籍3人,兴国、宜黄籍各2人,南昌、乐安、临川、修水、于都、贵溪、九江、瑞昌籍各1人。年龄在21岁至26岁之间。他们中最早赴法勤工俭学的时间是1919年3月17日,最晚的是在1920年11月7日。1919年去的有11人,1920年去的14人,大多数是在蒙达尔公学和马赛公学,一部分分散在其他地方,所学专业以机械、机电为主,也有学习建筑工程、航海等专业的,学习期间在十多个地方做工。

事实上,除以上25人外,还有确凿史料可以证明当时赴法勤工俭学江西籍人士还有:熊雄、许德珩、陈宝镗、黄禄祥、潘毅、袁税伯、金树章、刘克俊、谢承瑞、骆涌庄等人。可见当时江西赴法勤工俭学者,应为30多人。

赴法留学的青年学生在法国除了要受法国政府管理、社会生活限制、生活艰苦磨炼外,还要受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国当局的管理和限制。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半工半读,经受了各种考验和磨炼,但仍不懈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江西去的30多人中,一些人发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如进贤籍的饶国璋,在“工业救国”思想指引下,苦攻

法语,为钻研工业技术,先后在法国的飞机制造厂、发动机制造厂等多家工厂做工和学习,掌握了当时法国甚至欧洲最新的航空科学技术和汽车制造技术;南康籍的谢承瑞入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就读,后升入法国炮兵大学学习;修水籍的李凌鹤入读法国国立霞朗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到法国工厂学习机械技术,成为机械工程师。经过多年的学习,他们带着一身的技能相继回到祖国,在各自的岗位和领域做出贡献。相当一部分人与其他各省赴法的志士仁人团结在一起,学习新知,淬炼思想,积极参加了各种维权斗争。他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斗争实践中走上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有的加入了旅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有的加入了旅欧共产党组织,其中的优秀分子被派往苏联东方劳动大学继续学习,后陆续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活动,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中坚,杰出的人士有宜丰籍的熊雄、临川籍的傅烈、南昌籍的饶来杰、萍乡籍的彭树敏等人。

江西籍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他们对民主科学的追求、对革命的执着,始终教育鼓舞着后人,而且对江西地方革命乃至中国革命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会员录》这件特殊的文物,以最沉静的姿态,讲述着最动人的故事,重现了一个世纪前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出国求学运动,采取边学习边工作的留学方式,打破了只有权贵官宦子弟才能出洋留学的惯例,使得众多的家境贫寒的有志青年得到了增长知识、学习新思想、新技能的机会。他们在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涯中,以顽强的毅力工作的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批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储备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中坚力量,也为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才,最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